

二十世紀人類發展的教訓

——《國家的視角》讀後

● 戴利朝

二十世紀各種國家大型規劃和社會工程閃亮登場，但大都以失敗告終。斯科特在其新著《國家的視角》中，以蘇聯的集體化、埃塞俄比亞的強制村莊化、巴西利亞的新建設等為案例，試圖解釋這些烏托邦式大型社會工程失敗背後的真實邏輯。實際上，全書試圖回答的兩個問題就是：這些大型社會工程為何及如何產生？這些工程最終又為何失敗？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著，王曉毅譯：《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二十世紀是人類社會發生空前變革的世紀，也是一個經歷無數慘劇的世紀。懷抱變革社會和改善人類狀況的理想，各種國家大型規劃和社會工程「閃亮登場」，然而，這

些發展項目卻大都以失敗告終。著名學者斯科特 (James C. Scott) 以蘇聯的集體化、坦桑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的強制村莊化、巴西利亞的新建設等為案例，在其新著《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中，對國家發展的理念與實踐進行重新探討，總結了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災難背後的教訓。

正如斯科特在導言中所說，他撰寫該書的目的，在於解釋二十世紀人類的烏托邦式大型社會工程失敗背後所隱含的真實邏輯。實際上，全書試圖回答的兩個問題就是：這些大型社會工程為何及如何產生？這些工程最終又為何失敗？

圍繞上述目的和核心問題，作者將長達五百頁的厚重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共十章，附有三十七幅插圖。無論篇幅安排還是具體論證，都體現了作者的匠心獨運。全書的論證邏輯在於，第一部分着重闡述了國家通過對自然(如森林)、人口

和空間(比如城市)的簡單化和清晰化操作,包括科學林業、製作地圖、姓氏創造、人口普查、地籍名單、統一度量衡等具體項目的設計和實踐,為實施大型社會工程所做的一系列前提準備。接下來的兩個部分則首先將城市設計者和革命家的極端現代主義的理念和實踐與強調過程、複雜性和開發性的帶有批判眼光的理念加以比較,然後圍繞俄國的集體化、巴西利亞的建設、坦桑尼亞的村莊化等具體案例分析,揭示了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主要根源。最後一部分闡述了實踐知識的特徵及其重大意義,它恰恰是國家大型社會工程中「失去的環節」。經由上述四個部分的闡述,作者得出結論說,二十世紀烏托邦式大型社會工程產生於以下四個共同條件:

社會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規模開展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願望,獨裁的國家則有實現這一願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的基礎。(導言,頁6)

如所周知,大多數工程最後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①。作者認為,災難之所以會發生,主要根源在於國家對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的忽視,大型社會工程所謂的設計者和規劃者對其所面對並試圖加以改造的社會或生態知道得太少,經常忽略真實的和活生生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徵,從而排除了幾乎所有的地方知識或實用技術,其結果就是

對社會組織和自然環境的極度簡單化設計。然而,正是這些被忽略的地方知識或技術,成功地幫助地方社會免於完全的災難。

觀點經由論證而呈現,理論的創新往往來自於一系列關鍵概念的重新闡發或創造。通常地,高明的作者都善於將其關鍵概念和新理論精心巧妙地安排於章節之中,從容而自信地將其揭示給讀者。通觀全書,「簡單化」(simplication)、「極端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米提斯」(mētis)正是斯科特重點闡述並精心布局於該書各個部分的關鍵概念。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三個概念依次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以及最後一部分的「關鍵詞」。

先來看**簡單化**。一般而言,從國家的視角看,人口和社會空間愈靜止、愈是標準化、統一化,也就愈清晰,也就更適於官方的統治技術。簡單化的典型體現在於,國家試圖通過一系列項目將人口、空間與自然轉變為一個封閉的系統,如地圖。其具體步驟有:首先要建立通用的度量或編碼單位,其次是按照這些新單位對同屬一類的各項進行計算和分等,最後予以集合,創造出令官員滿意的社會事實。可見,國家簡單化的過程呈現出以下特徵:只針對官方感興趣的內容;都是成文的文件事實;靜態的事實;集合的事實以及對國民的分類與集體評估。其實,簡單化又是「清晰化」的「孿生姊妹」,二者都是現代國家機器的基本特徵,從根本上說又是國家實施其社會工程的具體方式。在作者看來,簡單化和清晰化的結果是巨大的,即雖然創造

大多數工程最後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作者認為主要根源在於國家對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的忽視,大型社會工程的设计者和規劃者對其所試圖改造的社會或生態知道得太少,經常忽略真實的和活生生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徵,從而排除了幾乎所有的地方知識或實用技術,其結果就是對社會組織和自然環境的極度簡單化設計。

米提斯本來是古典希臘語的一個混成詞，作者用它指人們「在對不斷變動的自然和環境作出反應中形成的廣泛實踐技能和後天獲得的智能」，他強調，米提斯是影響特定事件最終結果所必需的能力和經驗。作者認為，米提斯具有重大意義，國家大型社會工程正是由於喪失了這一環節而遭受巨大失敗，而地方社會或普通民眾卻由於擁有米提斯而免於更大的災難。

出一個「透明社會」，但國家迷失了自己，社會也遭殃了。

再看**極端現代主義**。這是作者花費很大篇幅並反覆強調的一個概念，他認為，這一概念非常適合用來表達國家「對自然和社會管理秩序的雄心」。極端現代主義的基石是人們對科技進步和人類理性的強烈信念。從其起源來說，極端現代主義其實是伴隨着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席捲歐美乃至第三世界的工業化潮流而來，並借助於科學和技術的合法性而獲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工程師、設計者、建築師、科學家和技師等都是極端現代主義產生的「社會土壤」，而掌控國家權力的官員或首腦則將極端現代主義的熱情傾注於對自然和社會的大規模改造。顯然，極端現代主義者不僅僅在乎信仰，也關注自身的利益。只不過，國家官員的政治利益（常常契合於國家掌控社會這一根本目的）常常都是以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社會景觀的名義出現的。斯科特揭示出，極端現代主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可以為左派或右派擁有，也存在於東方或西方國家，但是它卻更容易產生於獨裁主義國家。從二十世紀歷史來看，極端現代主義有時也受到抵制，即主要是來自以私人領域、私營部門和代議機構等三方面因素為體現的自由民主觀念和制度的制約，一旦這種制約不存在甚或力量不夠，極端現代主義則會大行其道。進而言之，一個國家要想跳出極端現代主義的陷阱，其根本途徑是培育並發展出充分的自由民主制度。

最後看**米提斯**。這本來是古典希臘語的一個混成詞，源出於希臘神話。作者重新賦予其意義，專門在最後一部分進行總結性的詮釋，可見該概念在全書中的重要性。以往人們常常將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稱為「地方性知識」、「本土技術知識」或「民間智慧」等等，與前人的這些概念都不同，作者代之以「米提斯」這一概念。它是指人們「在對不斷變動的自然和環境作出反應中形成的廣泛實踐技能和後天獲得的智能」（頁429），他強調，米提斯就是影響特定事件最終結果所必需的能力和經驗，最好是從每日的實踐和經驗中學習而形成。也許這些定義還嫌抽象，他借助各港口的領航員、有經驗的農民、屠宰高手以及外科整形醫生等特定環境的知識持有者案例，進一步揭示了米提斯的地方性和特殊性。作者認為，米提斯具有重大意義，國家大型社會工程正是由於喪失了這一環節而遭受巨大失敗，而地方社會或普通民眾卻由於擁有米提斯而免於更大的災難。作者對地方社會米提斯的強調與其所持的民間立場緊密相關，也是與全書採取的「國家的視角」配合展開的另一條主線。

從筆者的閱讀體驗來看，本書一大特色是比較研究，作為2000年美國比較研究學會馬蒂·多甘獎（Mattei Dogan Award）「最佳比較研究書籍」當之無愧！無疑，該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豐富的案例比較，從人物、事件、國家等多層次多方面並時常相互結合加以比較。比如在探討「極端現代主義」在規劃城市中的體現時，作者敘述了

既有的兩個城市試驗——巴西利亞和昌迪加爾 (Chandigarh)，展示了共同性，更重要的在於其後對這兩個試驗的設計者勒庫布西耶 (Le Corbusier) 和雅各布 (Jane Jacobs) 的比較，從中我們看到兩者的思想可謂針鋒相對，而雅各布對前者不遺餘力的批判也躍然紙上。具體來說，本書的比較方法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書中大量使用「對比式標題」，如「社會事實：原始的和加工過的」、「比較兩個農業邏輯」、「薄弱的簡單化和實踐知識：米提斯」^②、「試驗田和實際的農田」、「小說中的農民和真實的農民」、「外來的信念與地方實踐的區別」、「單一栽培和多元栽培」、「恆久的農田和輪耕」、「化肥與肥力」等等，這些標題意思淺顯，讓讀者一目了然。其次，作者善於運用比喻進行比較。比如在比較現代革命政黨的設計理念時，作者視列寧為「革命的建築師和工程師」，而視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為「革命的內科醫生和助產士」，這一比喻本身意涵豐富，深刻揭示了二者的不同^③。他還借鑑伯林 (Isaiah Berlin) 有關「刺蝟和狐狸」的比較說：「科學林業官員和地籍調查官員像刺蝟」，「而自然主義者和農民像狐狸」，因為前者只知道一件事 (商品化木材或土地財政收入)，而後者卻了解森林和耕地的許多方面。這一比喻在反諷中明確表達了作者的取向。最後，作者的比較還具有跨越時空、多角度同時進行的特點。也正是從作者這種縱橫比較中，我們發現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以後的簡單化和清晰化項目，其實與其前殖民

化時期和殖民化時期的發展項目息息相關，同時還了解到，蘇聯的極端現代主義其實不僅和沙皇時代的「行政烏托邦」和法國大革命的烏托邦特徵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且和美國極端現代主義之間有直接的聯繫。

在作者從容的論述中，該書展現了豐富有趣的案例。不妨列舉幾例：在討論獨裁式極端現代主義的限制問題時，作者比較了兩種不同作物的生產，一是「無產階級作物」——小麥，二是「小資產階級作物」——覆盆子漿果。相比之下，前者適合於大規模的農業和機械化，在播種以後直到成熟、收割、脫粒和進倉，中間很少需要管理；但後者就不同了，它需要特殊的土壤、日常化的修剪、反覆的手工採摘、良好的包裝等等，因而不適合集體農莊，只適合個體農戶的副業生產。也就是說，兩種不同作物不僅需要不同的制度配置，而且覆盆子的成功種植更需要豐富的地方知識和經驗，極端現代主義者在此常常碰壁。又如，作者在論述了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化之後，還分析了埃塞俄比亞的案例。1985年後者開始大規模實施村莊化，預期最終將遷移3,300萬農村人口，並將其安置在統一規劃設計的新村莊。從航空照片看，新村莊清晰地表現了標準化的、整數的和官僚化的精神，大批官員推動了這種千篇一律的村莊設計，不僅私人領域發生了變更，標準的住房代替舊房；而且傳統的鄉村公共空間也被迫經歷了轉型：只留下了國有的空間如辦公室、文化室、衛生所等作為公眾聚集的場

1985年埃塞俄比亞實施大規模村莊化，預期最終將3,300萬農村人口遷移到統一規劃設計的新村莊。但新的定居點與其說是村莊，不如說是犯人流放地。這一強制移民和定居化工程使寶貴的地方知識遺產和具有這些知識的活的社區被廢棄了，村民過去的主要依憑或社會資本被剝奪了。結果為千百萬農民帶來了致命的危害，最終也危害了埃塞俄比亞軍事政府自己。

如果村莊化是如此的理性與科學，那為何它會帶來如此普遍的毀滅？作者相信答案就在於，這些或是打着「發展」的旗號、或是作為社會福利項目而推行的農村定居和生產的社會工程，從真正科學和理性的意義上說並非是科學和理性的。還如，由於米提斯知識是不成文的和自動的，具有這種知識的人常對此無法言傳。

所，所有私人商店、茶館、小的貿易站都被禁止了。新的定居點缺乏必要的社會服務，與其說是村莊，不如說是犯人流放地。這一強制移民和定居化工程使寶貴的地方知識遺產和具有這些知識的活的社區被廢棄了，共同的紐帶、互惠與合作的網絡、地方的慈善和依賴等這些村民在過去缺衣少食時能夠生存的主要依憑或社會資本被剝奪了，其結局是，「為千百萬農民帶來了致命的危害，最終也危害了埃塞俄比亞軍事政府自己」（頁342）。他反問道，如果村莊化是如此的理性與科學，那為何它會帶來如此普遍的毀滅？作者相信答案就在於，這些或打着「發展」的旗號、或作為社會福利項目而推行的農村定居和生產的社會工程，從真正科學和理性的意義上說並非是科學和理性的。還如，由於米提斯知識是不成文的和自動的，具有這種知識的人常對此無法言傳，因而作者在解釋米提斯時運用了大量醫學發明或臨牀診斷的案例。比如對白喉、兒童的貧血症、早期梅毒等的經驗判斷雖然都可以通過試驗或測量得到證實，但相較於米提斯，這些方法太慢、太辛苦、太浪費金錢，且常不明確，而在一個有經驗的醫生那裏，米提斯可以幫助他省卻這些麻煩。米提斯知識的微妙和深奧不光體現在醫學上，比如，在印尼上年紀的武吉士（Bugis）船長即使在沉睡中，只要航向、天氣、水流或三者的任意組合出現變化，他立刻就會醒來。原因在於，船長掌握了米提斯。

通觀全書，豐富多彩的資料構成了本書比較研究的堅實基礎，又

是其一大特色。首先，從資料「產地」的全球性可見其來源的豐富多彩：德國柏林、法國馬賽、澳大利亞堪培拉、荷蘭阿姆斯特丹、意大利貝拉吉奧、美國耶魯大學等地成為作者寫作和思考的廣闊空間，無數次的跨國學術交流，也是作者收集資料的絕好時機。作者對世界各地資料的採集，這不僅意味着學術研究所需的艱辛和毅力，在我看來還蘊含着更重要的意義，即作者的成果其實是跨國交流和研討的產物，結合其他學者的介紹我們可見一個跨國性或全球性的「學術共同體」正在甚至已經形成。其次，注重田野工作。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取向是斯科特政治學研究的特色。他早年就在馬來西亞從事過兩年的田野工作，憑所獲資料寫就《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相比之下，作者為寫作《國家的視角》所涉入的田野工作更廣泛，而且更為與眾不同的是，斯科特不僅僅是進行學術意義的田野調查，而且投身於田野勞動，從中獲得的真實體驗，也滋養了其獨特的思想，成為其寫作的豐富源泉。顯然，農業研究項目和田野工作的實踐、人類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在斯科特身上得到了完美結合。再次，斯科特徵引資料時不拘一格，除取自我們常見的學術論著之外，舉凡地圖、諷刺詩、照片、電影、故事、檔案、科幻小說、戲劇、信件、營養手冊等都是作者論證的依憑。最後，本書資料之廣從該書大量的腳註可見一斑，作者不厭其煩地將支持或反

對自身觀點的論據都匯集起來，其「立此存照」而不是「集粹」的做法，也為日後學者的學術對話和知識積累提供了較好的平台。

除比較研究外，該書辯證的分析也非常突出。的確，斯科特很自信卻不乏謹慎：作者對極端現代主義持有深刻而激烈的批判態度，但同時又告誡說：千萬不要將其與科學實踐相混淆；他對於農民的適應性和實踐能力非常肯定，稱讚他們掌握的本地知識是任何一個科學家都無法比擬的，但同時也認為，應該將他們看作是終其一生都在試驗中的試驗者，他們也會受到觀察能力的限制，也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在作者眼中，國家是「一個令人苦惱的機構」，它既保護又限制人們的自由，一般情況下國家並不會無視其國民的價值、希望和目標而威脅到人類的美好生活，但「我們須要權衡國家干預所帶來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作者同時注意到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現代國家能力有巨大提升，實現了稅收和直接統治的目標，國家官員也直接進入到以前不透明的地方社會；另一方面，現代國家官員通常逐漸從地方社會中游離出來，其標誌就在於他們對社會的極端抽象或簡單化設計，這一看似悖論的過程恰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極大地影響了大型社會工程的實踐。總之，經由這種辯證的比較，國家與地方社會水乳交融、相互依存的關係得到揭示，而國家大型社會工程設計者對地方社會的無知或忽略，也得以自然而逼真地呈現出來。就後者來說，相同地方的

同一種田地布局，對於那些參與地籍調查的官員來說是不可思議和非理性的，但對於本地農民而言卻是簡單而有效的；專業語言對於官員來說是簡單的東西，但對於多數農民而言卻是令人迷惑的；再如，科學林業的實施，可以為以高級林業官員、財政官員為代表的國家帶來許多好處，但對於農民和生態環境來說卻是災難等等。甚至就其結論的限度而言，他相信自己的整體結論並非僅僅適於解釋「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國度或區域，而可以有更大的解釋力，但這樣做的前提是要作適當修改。

閱讀該書不時掀起筆者內心的波瀾，這可能不在於其觀點乃至方法特色，而源於作者所持的底層立場！比如，作者毫不諱言自己對米提斯的稱讚，甚至說，這部著作應被看作是「對普通人所具有的關於他們周圍社會和自然如何運作的實踐和有用知識，以及他們抵制那些危害社會和自然的項目的能力的讚頌」。這樣的立場其實從作者研究的初衷就體現出來，即為甚麼國家似乎總是四處流動的人口的敵人？這一追問所包含的立場正是普通人的立場、弱者的立場。從這一立場出發，作者還追問道：為甚麼在西方取得成功的現代科學農業模式，在第三世界總是受到挫折？也正是由於採取了這樣一種立場，作者的發現顯得與眾不同：為國家所忽略的東西恰恰非常重要，被社會工程設計者視為混亂不堪的事物其實井然有序，很多讓官員感到迷惑的東西恰恰具有豐富的多樣性；習慣等雖然是非常地方化的、特殊的，但

在作者眼中，國家是「一個令人苦惱的機構」，它既保護又限制人們的自由。一方面現代國家能力有巨大提升，國家官員也直接進入到以前不透明的地方社會；另一方面，現代國家官員通常逐漸從地方社會中游離出來，其標誌就在於他們對社會的極端抽象或簡單化設計，這一看似悖論的過程恰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極大地影響了大型社會工程的實踐。

作者對極端現代主義和科學霸權的批判尤其值得我們深思，比如他對可視秩序的審美熱情、對官僚邏輯與商業邏輯的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批判，對當下中國不少追求亮化工程的城市規劃者或設計者而言不啻是一記棒喝。一句話，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教訓就在於，制訂和實施統一的社會發展規劃之前，必須要了解 and 尊重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

卻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可塑性；讓官員迷惑的地方空間布局卻可以為當地民眾提供政治安全、生活便利以及秩序自治；非國家的度量單位外表容易讓人感到迷惑，但在當地其實有意義，也是基於人們都了解的標準，等等。儘管如書名所示，斯科特強調一種「國家的視角」，但與此同時他還將國家與地方互動的關係模式始終貫穿於其全部分析當中。在這種雙重的視角下，作者對社會的詮釋有助於讀者更加全面而充分地理解國家。作者的寫作富於技巧，雙重的視角與比較的方法可謂異曲同工、水乳交融。從根本上來說，全書與其說是體現了作者的「國家的視角」，毋寧說是斯科特從「國家的視角」來為人類總結教訓，為普通民眾而呼籲！

掩卷而思，作者的呼籲言猶在耳：「秩序的建立不必壓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內容」，因為「壓制地方和流行的東西往往會帶來無序」，反而會導致項目設計者預料之外的後果；不僅要意識到國家通過簡單化改造世界的的能力，更要看到「社會在修改、擾亂、阻礙，甚至顛覆外界強加的各種條款方面的能力」，在這裏應當區別「紙上的事實與實際的事實」。作者對極端現代主義和科學霸權的批判尤其值得我們深思，比如他通過雅各布表達了自己對野心、對直線和可視秩序的審美熱情、對官僚邏輯與商業邏輯的緊密結合等主要方面的批判，這對當下中國不少追求亮化工程的城市規劃者或設計者而言不啻是一記棒喝。斯科特還批判了隱含於現代科學農業中的霸權邏輯^④，揭露了

科學邏輯對實踐知識的非科學輕視。這對時下第三世界國家盲目追求所謂農業科技化的做法同樣富於警醒意義。一句話，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教訓就在於，制訂和實施統一的社會發展規劃之前，必須要了解 and 尊重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

一部好的作品，不僅能矯正我們習慣性的偏見，還能提供繼續思考和探索的動力。同樣地，該書也留給讀者反思的廣闊空間。在筆者看來，斯科特的論述也存在值得進一步斟酌之處。其一，如何全面看待在國家實施大型社會工程過程中地方民眾的作用？對此問題的回答，作者似乎過於強調基層民眾對國家實施大型社會工程的抵制或反抗。強調國家的視角，從國家的初衷、意圖及其實際效果來分析發展問題，這無疑是準確的，也是作者着意創新之處。而國家視角離不開地方視角，因此作者揭示了民眾或「社會」對國家的抵制或反抗。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地方民眾對於國家實施大型社會工程的態度只是反抗嗎？儘管作者強調地方民眾由於擁有米提斯而免於更大的災難這一點，但其着眼點仍然是批判國家的失誤（即失去了米提斯這一環節）。事實上，舉凡大型社會工程的實施，都是一個多元博弈或妥協的過程，其中每一個行動或步驟都不免打上權力關係的印記。具體地，「國家」與「社會」不僅有衝突，有時也會有妥協乃至一致，尤其是在革命或「發展」大潮中，國家與社會的「合謀」也合乎情理，甚至常常出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國家工

程的實施，地方社會或民眾無論心態還是行動都很複雜，常常是抗拒與接受並存，同時起阻力與推力的作用，難以其中一個方面來概括。其二，簡單化只是國家大型社會工程實施的前提？還是也是這一過程的產物？作者認為，簡單化作為現代國家機器的基本特徵，是大型項目實施的先存條件。但在筆者看來，追溯國家的成長史可以發現，簡單化其實也是國家設計的產物。換言之，國家幾乎從誕生開始就面臨着管理和控制相對龐大的社會這一基本職能，而要完成這一職能，較為簡便的方法就是將社會簡單化。雖然國家對這一任務從來就沒有很好地實現，但是對簡單化的追求從前現代化國家到今日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一直沒有摒棄。其三，姓氏的創造是國家規劃的一部分？還是姓氏主體自身的發明？作者舉秦朝中國為例認為，「固定的父系姓氏的形成和父系家庭的建立都源於早期國家的簡單化」，進而敘述了十四世紀以後在佛羅倫薩、英格蘭等歐洲地區和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地官方為百姓「創造」姓氏的歷史過程。他認為，姓氏的普遍採用是近代的歷史現象，一直到二十世紀還在許多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的邊疆地區持續進行。無疑，人口管理是任何國家都要面對的任務，但將姓氏的發明或創造歸結為標準化和清晰化的國家計劃或官方的社會過程，卻未必符合史實。以中國為例，儘管國家早熟，但古文獻卻告訴我們，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姓氏都有一個漫長而緩慢的歷史形成過程，並非全由帝王賜予或國家創

造。只是在漢代以後人們才接受帝王擁有賜姓權力的觀念，諸如賜姓、改姓、貶姓、複姓等出於政治需要或帝王意願的造姓活動開始出現^⑥。也就是說，人們主要出於生育和地緣關係創造自己的姓氏，國家的作用卻並非主要。

另外，從寫作方面來看，該書篇幅厚重雖然不失文采，但要是能更簡潔一些則會更好。事實上，作者非常具有舉例的耐心，但旁徵博引有時也難免重複。比如，作者從書一開頭就集中解剖「科學林業」，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具有相同性質的事物通常具有相似的發展邏輯，「一旦我們了解在林業管理中簡單化、清晰化和操縱是如何被運用的，也就可以了解現代國家在城市規劃、農村定居、土地管理和農業中如何使用了相似的觀察透鏡」（頁4）。換言之，管理科學林業的邏輯與國家在管理城市規劃、農村定居、土地管理和農業諸方面的邏輯是一樣的（作者也反覆強調這一點），既然如此，讀者只須了解科學林業的運作邏輯，就無須再花時間去閱讀其他案例。但問題在於，隨後對城市規劃諸方面的論述中作者依然旁徵博引，大量舉例，從而導致論證的反覆。整體來看，作者的案例分析尤其是事實或論據列舉顯得有些繁瑣。當然，資料的旁徵博引和分析的簡明扼要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張力，更何況作者所進行的是一項跨越時空的比較研究。因而瑕不掩瑜，本書仍然足以帶給我們珍貴的啟迪。

最後應該回到中國研究。在細讀該書的前前後後，始終縈繞於我

斯科特似乎過於強調基層民眾對國家實施大型社會工程的抵制或反抗。事實上，舉凡大型社會工程的實施，都是一個多元博弈或妥協的過程，「國家」與「社會」不僅有衝突，有時也會有妥協乃至一致。地方社會或民眾無論心態還是行動都很複雜，常常是抗拒與接受並存，同時起阻力與推力的作用，難以其中一個方面來概括。

昔日中國與蘇聯、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等一樣，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一員，也曾經並且至今還在推行各種大型社會工程，也曾令基層大眾承受社會災難。但與此豐富複雜的歷史極不相稱的是相關學術研究的貧乏。斯科特預料，其結論也適於解釋現代中國的「大躍進」時期和李森科主義的農業進步時期，但究竟解釋力有多大，作者期待中國學界能予以回答。

心的是中國問題，有時是強烈的共鳴，有時又感到困惑，更多的時候甚至希望作者也能一併研究中國。如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極不平凡，與蘇聯、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等作者重點探討的對象一樣，昔日中國同屬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也實行過多年的集體化，曾經並且至今還在設計並推行各式各樣的大型社會工程，也曾使得基層大眾不斷承受或遭遇本可以減免的社會災難等等。與此豐富複雜的歷史極不相稱的是相關學術研究的貧乏或簡單化。斯科特預料，其結論也適於解釋現代中國的「大躍進」時期和李森科主義的農業進步時期，但究竟解釋力有多大，作者期待中國學界能予以回答。作者並未專門研究中國問題，只提及古代中國的戶籍制度、宗族姓氏制度、原始文獻以及中國的激進社會主義運動等，比如他提到「大躍進」期間中國將典型作為普遍實施的現象。應該說，作者把具體的研究任務留給了關心中國問題的學人。

的確，斯科特《國家的視角》一書已經為學界研究中國的類似問題樹立了典範，同時奠定了更高的學術平台，新世紀的中國研究必將從中獲得新的啟迪和動力。

註釋

① 作者這樣說：「在我的心中，用失敗來形容這些發展的災難是遠遠不夠的。」它們都是「二十世紀人類巨大的悲劇，無論是生命的喪失或生活都無可逆轉地被打

亂」（《國家的視角》，導言，頁4）。

② 這一標題似有不妥，因為實踐知識與米提斯近於等同，二者都是與「薄弱的簡單化」相對而言。愚猜想，可以將其換成「薄弱的簡單化與米提斯」或「薄弱的簡單化與實踐知識」或「薄弱的簡單化與實踐知識——米提斯」，意義更為明瞭，也更切合作者原意。

③ 當然為使這一論證更有說服力，作者還介紹了反對列寧的科倫泰（Aleksandra Kollontay）和工人的真實想法和實際狀況以供比較。

④ 作者這一思路在其有關東南亞的論著中早已顯現，他發現在馬來西亞的村莊，貧困的村民創造了一種「記憶中的經濟」，即藉着對舊有土地制度的誇讚來譴責機械耕作的負面影響（*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有關農業科技產品中所蘊含的商業取向與政治取向、科學神話與科學迷信，及其與普通消費者關係的中國案例研究，可參見郭于華先生新近對轉基因大豆在中國生產和傳播過程的社會人類學考察（〈天使還是魔鬼——轉基因大豆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考察〉，《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頁84-112）。

⑤ 參見錢杭：《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宗與聯宗組織》（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第二章「中國古代的姓氏制度」。錢先生在該書中還嚴格區分了「姓」與「氏」的聯繫與區別。

戴利朝 男，中山大學政務學院2003級博士生，《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助理研究員。史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社會學。